

# 常胜“戚家军”的五条秘诀

■袁育明

明代著名爱国将领、民族英雄、军事家戚继光，其亲手创建的“戚家军”，南征北战四十余年，南平倭寇，北镇蒙古，援朝抗倭，战无不胜。戚继光还积极推动冷、热兵器的创新发展和编组应用，结合战争实践，编写了《纪效新书》《练兵实纪》，被后人列入“中国古代十大兵书”，堪称中国古代兵学向近代兵学转型的重要代表人物。

而戚继光之所以能够锻造一支常胜之师，与其重视练兵备战是分不开的，其经验至今仍有重要的价值。

**严格兵员选拔标准。**兵不在多而在精，明朝中后期军户和卫所制度早已千疮百孔，明军战斗力极为低下，士兵往往遇敌即逃。曾有一股不足百人的倭寇竟长驱直入杀到明陪都南京，12万明军束手无策，最后虽将其全歼，但自身伤亡却高达数千人。嘉靖三十五年（公元1556年），29岁的戚继光调任浙江宁（波）绍（兴）台（州）参将，深知明军积弊的他，在直浙总督胡宗宪的支持下，决心另辟蹊径、重新招兵、编练新军。戚继光不单纯依据武艺高低选拔士兵，他在《纪效新书》中总结道，士兵不能选“城市油滑之人”或“奸巧之人”，最好是那些民风彪悍、深知民间疾苦、对倭寇有切肤之恨的“乡野老实之人”，因此他避开绍兴等经济发达地区，专门到义乌选拔了四千体格健壮、富有血性胆气的农民和矿工，按照“把、哨、旗、队”等新编制组建建军。从兵源入口严格把关的同时，戚继光还针对新兵个

性特点，依据“藤牌宜于少年便捷，狼筅、长牌宜于高大雄伟，长枪、短兵宜于精敏有杀气之人”的原则，因材施教、分配战斗任务。并针对明军其他部队“将不知兵”的问题，按照“把选哨、哨选旗、旗选队、队选兵”的方法，放手让各级军官自行任命熟悉信任的下属，下级出师则由负责选拔的上级负责，既密切了上下级关系，又落实了各级军官的责任。

**积极装备新式武器。**戚继光为对付倭寇锋利的日本刀，专门发明了狼筅这种特种兵器，选用南方质地坚实的毛竹制成，长度超过三米，将竹端削尖，并保留四周尖锐的竹枝，可刺可扫，不惧日本刀的砍削。同时，明代正处于冷、热兵器交替的时期，当时倭寇通过引进欧洲先进火器，对明军形成很大的火力优势，戚继光在实战中深刻认识到新式火器的威力，于是按照“旧可用者更新之，不堪者改设之，原未有者创造之”的原则，大力提高明军火器的威力和数量，并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地雷——“自犯钢轮火”，内装火药、钢轮和打火石，埋设于敌进攻必经之地，比欧洲人发明地雷早了三百多年。“戚家军”在南方抗倭时火器装备率已达部队编制的一半以上，在北方抵御蒙古时更是达到七成以上，取得明显的装备优势。

**因敌制宜创新战法。**明军多由军户或临时招募的士兵组成，以往训练多只注重个人武艺、单兵作战，而倭寇都是受利益驱使的亡命之徒，骨干成员多

为日本久经战阵的落魄武士、刀法精熟，装备的日本刀也比明军军刀精良，单兵作战能力极强。戚继光认为明军士兵仅靠短期训练、单打独斗难以胜过倭寇，必须创新战法，通过阵法形成合力，以便扬长避短、克敌制胜。于是戚继光针对东南沿海滩涂较多、倭寇喜欢小股突击的特点，独创了新式阵法“鸳鸯阵”。这种阵法左右对称，以12人为一队，接敌时，2名藤牌手在前遮挡敌箭矢和弹流，并投掷标枪逼敌惊慌躲闪，后面2名狼筅手趁乱用狼筅将敌人扫倒，左右共4名长枪手负责照应前面的藤牌手和狼筅手，并趁机刺杀倒地的倭寇；最后2名镗钯手作为第二线攻击力量，并保护本队后方和翼侧；1名队长和1名伙夫则居中配合作战，这种阵法长短兵器结合、攻防兼备、刺扫兼顾、灵活多变，可根据战场需要变化为左右两小阵或左右中右三小阵等多种阵式，成为“五行阵”“两仪阵”及“三才阵”，有效克制倭寇优势的发挥。

**面向战场为战而练。**戚继光从残酷的战争中深刻认识到“教兵之法，美观则不实用，实用则不美观”，因此其练兵、著书唯求实用。一方面，戚继光从实战出发从新兵。他不仅要求“平时所学的号令营艺，都要照临阵一般”，果断删除不符合实战要求的训练内容，还要求士兵平时训练所用武器、负重都要大幅超出战时分量，以便到了战时，力量“用上五分之一，便能以一敌五；用上一半，便能所向无敌”。戚继光五十多岁时，还亲自到步兵队充当天队长进行训

练示范。另一方面，戚继光还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来提高训练成效。他定期对官兵的各项技能进行考核，并区分上、中、下三等九则进行记录归档，成绩优秀的可得到赏银和升职，反之就降级或处罚，甚至被革退。

**依法治军从严执纪。**戚继光为迅速扭转当时明军军纪涣散、临阵脱逃等顽疾，采取了现在看来很残酷的平战一体的“连坐法”，规定战时一人退却斩一人，全队退却斩队长，队长战死全队退却则全部斩首，甚至“一伍内，二人犯，连坐伍长，三人犯，伍长同罪；一队内，二伍各有犯，连坐队长”。但同时，戚继光也注重给初犯的士兵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并坚持治军先治官，对自己的亲属也一视同仁，曾因儿子和舅父的违令行为而严加制裁之，甚至传说其儿子因违反命令追击逃敌而被处死、引发争议。虽然“连坐法”的实施确有不人性之处，但通过实施该法，戚继光整肃了军纪，“戚家军”全体官兵实现了“集体负责”、互相监督，很快执行命令宛如一人，是其能够取得显赫战绩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

原典

李代桃僵，语出自《乐府诗集·鸡鸣》：“桃生露井上，李树生桃旁。虫来啮桃根，李树代桃僵。李树代桃僵，李树代桃僵，李树代桃僵，李树代桃僵。”李代桃僵的原意是指李树友爱互助，后指互相替代、代人受过等行为。在三十六计中，该计原文为“必有损，损阴以益阳”，即当局势发展到必受损失时，为了使劣势转为优势，应尽量牺牲局部以保大局，牺牲眼前以图长远。引申到军事上，是指在敌优我劣或势均力敌时，指挥者要善于筹算，当机立断，用局部的、暂时的损失换取全局的、长远的利益。

古代战例

战国后期，赵国北部常受匈奴骚扰。赵国大将李牧镇守北部门户雁门关，命令部队只许坚壁自守，还杀牛宰羊，犒赏将士。匈奴摸不清底细，一时不敢贸然进犯，李牧则趁机加紧训练部队。

公元前250年，李牧准备出击匈奴。为了迷惑匈奴军队，他故意派少数士兵保护边境百姓放牧。匈奴人见状，派出小股骑兵前去劫掠，赵军与敌骑刚一交手便假装败退。匈奴单于就此认为李牧既不敢出城征战，部队战力又弱不禁风，实在不足为惧，于是亲率大军直逼雁门关。而李牧早已严阵以待，兵分三路，给匈奴单于准备了一个大口袋。匈奴军轻敌冒进，被李牧分割包围，逐个围歼，单于兵败而逃。

现代战例

1946年6月下旬，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中原军区大举围攻，企图将中原军区部队消灭在以湖北省宣化店为中心、方圆不足几十公里的狭小地域内。根据上级指示，中原军区部队主力于6月26日向西突围，由皮定均率领第1纵队第1旅原地阻击敌人，掩护中原军区部队主力向西突围。

战斗打响后，敌军兵分3路，从1旅的正东、东南和东北方向扑来。面对多路进攻，在沉着应战的同时，皮定均率领旅党委结合敌情、地形和整个战役的发

展情况，制定了最佳突围方案：利用大别山地形复杂、便于机动的特点，掩护主力西去，然后向东突围，隐蔽地跳出重围。

决心确定后，第1旅官兵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，在掩护军区主力西进转移后，先向西，后向东，孤军东征，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包围和堵击，辗转24个昼夜，行程750余公里，进行大小战斗23次，歼敌上千人，以“还是一个旅，五千人”的建制，胜利到达苏皖解放区，圆满完成了掩护中原军区主力向西突围的艰巨任务。

计谋分析

上述两个战例都应用了“李代桃僵”之计的同时，也体现了这一谋略的不同表现形式。李牧诱敌败匈奴属于“弃子争先”，即国棋中“逢危须弃”的要诀，以失去一些棋子，达到全盘棋活的目的。皮定均掩护主力突围属于“丢车保帅”。即在象棋中为了保住帅，宁可丢掉有攻击力的卒和车。不过，因1纵1旅战斗力太强，这辆车因大局所需被迫要“丢”的“车”也毫发无损的成功突围。

“李代桃僵”的谋略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形式虽然各具特色，但归根结底都带有“代”的底色。想要运用好“李代桃僵”之计，需要做到以下三点：

一是正确处理“李”与“桃”的关系。“李”表示牺牲的一方，“桃”表示被保全的一方。施行此计的关键是在战场上出现了需要“李代桃僵”的形势时，就既要会做“桃”者，也要会做“李”者。这就要求各级指挥员要能够选贤任能，部属则要有勇于牺牲、以成大局的精神。同时，“李”与“桃”的分量要衡量好，应注意“李”轻“桃”重，不能顾此失彼，更不能反方向替代，要确保“李”能成功代“桃”，否则，就可能“桃”僵“李”也枯。

二是指挥员要有“大将之风”。指挥



## 三十六计与古今战争

### 第十一计：『李代桃僵』

王玉奎 张苗

# 误判中国：解读麦氏战略之误

■李珽瑜

1951年3月底，道格拉斯·麦克阿瑟发表了最后一份战争声明，强调“中国没有足够进行现代战争的工业力量，中国军队的数量优势抵消不了陈旧战争机器的巨大缺陷。”“如果联合国把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的海岸线和腹地，那么，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。”然而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，三个多月后，骄横不可一世的“联合国军”，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迎头痛击下溃不成军。

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丢掉了指挥员最基本的战略清醒，犯了一系列本不该犯的战略误判，不仅使自己的职业军人生涯晚节不保，还把美军拖入了二战后损失最大、受挫最重、伤害最深的朝鲜战争。

误判来自片面的认知。麦克阿瑟在朝鲜最大的错误，莫过于彻底低估了对手。最具讽刺的是，他一向以了解“东方哲学”自居，但他对所谓的“东方人思维”的理解，却停留在旧社会形态的过去时。套用美国人的话说，麦克阿瑟也许了解马尼拉的富商、蒋介石那些胆小如鼠的腐败军官、东京街头卑躬屈膝的日本人，但他对饱经战争洗礼的朝鲜人和勇于献身的中国人，却一无所知。因此，当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再三警告“联合国军”不要越过“三八线”时，麦克阿瑟视若无睹。结果，麦克阿瑟用自己的失败，刷新了对中国军队战斗力的认知。美国人亚历山大·贝文在

《朝鲜：我们第一次战败》一书中给予中国人民志愿军高度评价，“中国共产党人在同物质条件优于自己的国民党人作战中，吸取了军事上的经验教训，找出了一套行之有效、克敌制胜的进攻模式，战胜了武器装备比较优越的敌人”。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历史学家们也写道，“中国军队令人敬畏，他们善于运用欺骗战术和达成攻击的突然性。尽管缺乏伙食，也没有其他的物质享受，中国军人被证明是吃苦耐劳、纪律严明的斗士”。

误判来自僵化的思维。尽管麦克阿瑟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，但他一直沉迷于既往的战争经验。在和中国人交手前，他曾对国会议员说，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被“大大地高估了”，美国只需要“出动500架战斗机，再派出像陈纳德这样的老将出马指挥就足够了”。他过于迷信美军的技术优势特别是空中优势，以为“中国人也会在白天列队走到美军阵前，等着美国飞机消灭他们。”正是这种僵化的思维，导致了战略判断上的重大失误。即使“联合国军”在前线遭到痛击时，麦克阿瑟依然一厢情愿地认为，只要切断中国军队兵力调动及补给支援通道，炸毁中朝边境线上的铁路、桥梁就足以减缓中国增援部队涌入朝鲜的速度。结果，“联合国军”等来的，是数十万经验丰富的中国志愿军。

误判来自过度的骄傲。在遭遇中

国人之前，麦克阿瑟刚刚力排众议，指挥完成了其二战后最出色的军事冒险：仁川登陆作战，一举扭转了美军在朝鲜半岛的战略态势。一段时间内，美国人近乎迷信般地敬爱这个非同凡响的军事人物。在一片追捧声中，麦克阿瑟的自信心膨胀到顶点，总统、政府、五角大楼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都难以入他的法眼。这种自以为是的狂妄和任性，几乎贯穿了麦克阿瑟在朝鲜战场的指挥全过程。战局顺利时，连令冒进逞能；战局不利时，则拼命鼓吹战争扩大化。对此，其继任者李奇微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：“由于麦克阿瑟眼看胜利在望，而且认定红色中国是只纸老虎，因而他只相信自己，听不进任何意见和劝告。就在几个月之前，他刚刚赢得了一场1:5000的赌博。现在，他还想再来一次，不过这次的赌注下得更大一些”。不幸的是，这一次麦克阿瑟赌输了，不仅输掉了赌注，还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军人生涯。（作者单位为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）



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，将“联合国军”一路打回“三八线”。



十进制与编制

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是最先发明十进制的民族，而这也影响到了苏美尔及其周边民族的军队编制。如居鲁士时期的波斯帝国军队就受到苏美尔人的影响，其部队也采取了以十进制为标准的编制模式。

虽然在波斯军队中最小的单位是5人制小队，但在部署战阵时，最小的作战单位是10人制中队。10个中队组成一个大队，10个大队组成一个可以独立作战的初级师，10个师则组成一个军级单位。而波斯人也经常以10人制中队作为自己队伍的纵深厚度。

有期变枪决

抗战胜利后，汪伪政权中的汉奸们被判死刑的不可少。但汪伪“外交部长”褚民谊的死刑判决却另有一番“曲折”。

褚民谊个人能力十分有限，只是因为同汪精卫、陈璧君有亲戚关系才得任用。抗战胜利后，褚民谊仅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，但褚民谊认为自己已经很老了，20年有期徒刑相当于无期，上诉要求减刑。在一群大汉奸里本不起眼的他，一下子吸引到了社会舆论的注意，其种种恶行被揭发得越来越多，最后20年有期徒刑就变成了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”。1946年，褚民谊被枪决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

假内行还是真外行？

1988年，印度军队决定将其一个FH-77B榴弹炮连部署到克什米尔地区的索伊斯机场，该机场所在的什约克河谷横向距离不过2公里，简易机场跑道甚至只有1845米，连印军吨位最小的安-32运输机都不敢起降，但运输榴弹炮必须用更大、更重的伊尔-76运输机。在索伊斯机场降落，伊尔-76运输机几乎是擦着两侧的山峰飞行，一旦飞过机场就必须在河谷中完成180度转身，并爬升至5600米掉头，否则就很有可能撞山。

印军中的某高级将领，对这一任务十分感兴趣，当飞行员们向其介绍伊尔-76在河谷中掉头是一大难题时，该高级将领竟然说，米格-23都可以在河谷中掉头，伊尔-76有什么问题？可米格-23的最大翼展也只是刚刚超过15米，伊尔-76翼展已经达到了50米左右，怎么可能是一回事呢？如果是其他军种的将领也就算了，而这位高级将领恰恰是印度空军的参谋长，说出这样的话，不知道他是个假内行还是真外行。

（乌沃）